

《鸣凤记》所涉史实问题考辨

伏涤修*

[摘要] 《鸣凤记》是表现明嘉靖年间反严嵩斗争的时事剧，剧作虽然信史色彩较浓，然仍有若干与史实不合之处。剧作选列的反对严嵩奸党的“双忠八义”，有人难称忠义，有人事迹不够典型，而在严嵩倒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有些人的事迹未能得到起码的表现。《鸣凤记》在情节演绎与细节表现上，也颇有对史实进行改造乃至完全虚构之处。

[关键词] 《鸣凤记》；史实；辨正

《鸣凤记》是明清时事剧的发韧之作，时事剧究其实质是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剧。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部较为接近当时历史、信史色彩颇为浓郁的剧作，仍有许多与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行迹不相吻合之处，本文即对《鸣凤记》中有违史实之处进行考辨。

一、关于反对严嵩奸党的“双忠八义”人选

《鸣凤记》中着力歌颂的反对严嵩奸党的忠臣义士是“双忠八义”，双忠是指夏言、曾铣，八义或称八谏臣是指杨继盛、吴时来、张翀、董传第、郭希颜、邹应龙、林润、孙丕扬。“双忠八义”之称出自《鸣凤记》第1出《家门大意》[西江月]曲，“八谏臣”之谓出自第1出下场诗^①。《鸣凤记》所写的“双忠八义”十个人，剧中事迹大多与正史所载相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堪称是反对严嵩奸党的忠义之士，但剧中形象也有与史实出入较大者，其中最明显的是对郭希颜的形象塑造。

《鸣凤记》中的郭希颜“道山学海功非浅”（第2出《邹林游学》[玉芙蓉]曲），邹应龙、林润慕名在杭州拜郭为师，成为郭的门生。后邹、林二人并登进士，与已在京城任翰林学士的恩师郭希颜一道，同去祭拜因反对严嵩而被杀的夏言、杨继盛。新中解元易弘器与郭希颜、严嵩俱为江西同乡，易家素与严家有隙，严家设计谋害易弘器。即将升任侍郎的郭希颜不顾自身仕宦前途，为救易弘器，尽言极谏，参奏严嵩，以致弃职归山。后圣旨下达，郭希颜被以诬谤大臣之罪被解递京师枭首。严嵩奸党倒

* 文学博士，淮海工学院文学院教授，222005。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历史剧文史关系研究”（15BZW109）的阶段性成果。

①本文所引《鸣凤记》均据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台后，严嵩被抄家，其子严世蕃被斩首，林润以严世蕃首级祭告郭希颜等人，“塑夏、曾、杨、郭诸忠臣神像在内，严家父子跪于台下，如岳坟故事，以为忠佞之鉴”（第40出《献首祭告》）。剧作最后，郭希颜和夏言、杨继盛等人一道，被朝廷平反昭雪，郭希颜被追赠荣禄大夫之号。《鸣凤记》中，郭希颜既是反对严嵩奸党的邹应龙、林润的恩师与精神领袖，同时他自己也坚决与严嵩奸党作斗争，他的罢官与被残害都与严嵩奸党有关。

《明史》中没有郭希颜的本传，《明史》卷三〇八《奸臣·严嵩传》中提到的受严嵩打击、迫害的大臣中及《明史》其他人的传记中，也没有提到郭希颜与严嵩的斗争。“郭希颜其人，在明清两代有关史籍中，未见有较为完整的传记载。他之所以被记入史册，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嘉靖二十三年四月上疏请立四亲庙，一是嘉靖三十九年上《安储疏》触怒嘉靖，命御史即其家杀之，传首四方”^①。这两件事，分别牵涉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和建储之议。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宪成化皇帝朱见深之孙，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之侄，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堂弟，因正德帝无子，也无兄弟，故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朱厚熜即帝位后，与礼仪派大臣们在其亲生父母尊号、皇考谁属问题上暴发旷日持久的“大礼仪”之争。礼仪派大臣认为，世宗应以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为皇考，以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世宗嘉靖帝坚持以生父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世宗追封其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后又多次加封，将其追尊为睿宗，他还将其生父兴献帝的牌位升祔太庙，排序在武宗之上。杨廷和等众多礼仪派大臣因反对世宗做法被惩处贬黜乃至廷杖致死，而迎合世宗心意的投机之徒如张璁、桂萼等则受到世宗的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希颜见张璁、夏言辈以议礼骤贵，心揣帝意，欲崇私亲而薄孝、武二帝，乃独请建四庙，祀高、曾、祖、考，斥孝、武二宗别祀。疏出，举朝大骇。礼部尚书张璧等斥希颜悖戾，议终不用。希颜由是得罪清议，久之，罢官家居”^②（卷五“《鸣凤记》”条）。《明世宗实录》卷二八五对郭希颜上疏请建四庙及所引起的争议作了详细记载。^③

郭希颜投世宗所好，要求庙祀世宗生父，别祀孝、武二宗，虽然得到世宗的欢心，但疏请之事过于“悖戾”，遭致礼部及朝臣的斥责。郭希颜不仅未因此疏获得重用，后来反被罢官家居十余年。我们可以看到，上疏请建四庙中的郭希颜，是一个“希宠干进”的政治投机者，而非封建时代坚持正统礼仪的正直官员，《鸣凤记》写郭希颜落职罢官源于参奏严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郭希颜的被杀，则和他上《安储疏》有关，郭希颜上《安储疏》，又和世宗晚年反对立储的心态有关。据《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五·世宗诸子》，世宗嘉靖帝共有八子，第一子哀冲太子载基，生二月而殇，第二子庄敬太子载壑，嘉靖十八年立为皇太子，嘉靖二十八年薨。嘉靖后期，世宗只有第三子裕王载垕、第四子景王载圳，其他诸子俱已去世。“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当立。帝以前太子不永，迟之。晚信方士语，二王皆不得见。”^④由于先后失去两个太子，世宗相信方士之言，为避免二龙相克，不愿再立太子。由于太子是储君，立储事关国本，故第二任太子死后，时有大臣请立太子，但世宗对此极为反感，嘉靖后期，立储成为违禁话题。在世宗反对立储的情况下，郭希颜上了一道《安储疏》。郭希颜上《安储疏》，从起因来讲，是他长期失职家居，不甘寂寞；从恩怨心理来讲，他对严嵩不满，因为严嵩身为他的江西同乡，多年来对他没有施以援手；从目的来讲，他希望借上疏获得世宗的注意与欣赏，重新出山做官；从方法上来讲，他是“以危言奇计侥幸大功”，是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孤注一掷。《明世宗实录》对郭希颜上《安储疏》前的心态与行为有所记载：“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颜，以失职家居，郁郁不乐，怨大学士严嵩，谋因事构

①刘致中：《〈鸣凤记〉作者考辨》，《艺术百家》2008年第5期。

②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慕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本，第229页。

③详见《明世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第5524—5525页。

④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14页。

之。当岁首，密使人人京，于城门闹市中悉揭匿名帖，言嵩欲谋害裕王，以动群情。”^①(卷四八一)郭希颜秘密派人进京放言，说严嵩要谋害裕王，他上《安储疏》奏请的核心就是保护王储安全，防止严嵩等危及王储安全，郭疏虽未直言建议立储，但依然触怒了世宗。《明世宗实录》对此事引起的反应有较详细的记载，从记载可知，郭希颜被杀主要是世宗自己的旨意。世宗对严嵩复下谕旨道：“细邪必无可赦之理，今不忠之臣，不义之民，皆恶不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辅相，概可见矣。”^②(卷四八一)世宗嘉靖帝认为郭希颜不忠不义，他上疏是对朝政不满，实际是对皇帝和宰辅不满，他不敢公开攻击皇帝，就攻击宰辅。从世宗的谕旨看，不仅不是严嵩挑唆世宗，反倒是世宗有挑动严嵩仇恨郭希颜的意味。在这种情况下，给事中蓝璧等人奏请严惩郭希颜，郭希颜被即时处斩并传首四方枭示。《明世宗实录》对郭希颜上疏被杀事件及后来的平反评价道：“希颜因自谓身虽废退，可以危言奇计侥幸大功，上即怒，必不至遂死。……而后世乃追议恤录，滥矣。”^③(卷四八一)《明世宗实录》的纂修者认为郭希颜误判形势，没有充分料及上疏的严重后果，还认为后世(指穆宗时代，穆宗即郭希颜希冀安储的裕王朱载垕)为郭希颜平反并无必要。《明世宗实录》纂修于严嵩倒台之后，且主持纂修的徐阶、张居正等人是反对严嵩的，纂修者不仅不为郭希颜之死喊冤叫屈，反而对为郭希颜平反追恤持有异议。这只能说明，郭希颜上《安储疏》导致自己身首异处，并不是纂修者认为的反对严嵩奸党的正义斗争，而是为一己私利的自我取祸之举。笔者将郭希颜《安储疏》与《明史》中所载的杨继盛、张翀、董传策等人的弹劾严嵩的奏疏进行比较，也明显可以感到，杨继盛等人的劾严奏疏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而郭疏危言耸听沽名钓誉。《鸣凤记》将郭希颜选作反对严嵩奸党的“双忠八义”之一，将其塑造为忧国忧民、反对严嵩奸党而牺牲的政治英雄，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除郭希额外，《鸣凤记》将孙丕扬作为反对严嵩奸党的忠谏之臣写入剧中，也缺乏历史依据。《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对孙丕扬事件有较详细的记载，但没有言及他有奏劾严嵩之事。《明史》卷三〇八《奸臣·严嵩传》中提及的弹劾严嵩父子与受严嵩父子迫害的人中，也没有提到孙丕扬。孙丕扬与严嵩事件的关联，主要是《天水冰山录》载其参与抄检严嵩家产。《鸣凤记》将孙丕扬当作“双忠八义”之一来表现，从反对严嵩奸党而言，孙丕扬的历史事迹并不具有典型性。而有一些理应作为忠谏之臣写入剧中的历史人物没有出现在剧中。如沈炼反对严嵩的事迹，在当时极具影响，沈炼其人堪称忠义，其事极为感人，其人其事在反对严嵩奸党的斗争中堪称典型。沈炼没有被《鸣凤记》的作者选入“双忠八义”，他的事迹没有出现在剧作中，颇令人遗憾。

二、关于严嵩的倒台原因及过程

《鸣凤记》中关于严嵩倒台原因及过程的描写也于史有异，剧中八谏臣前仆后继，先后劾奏严嵩、严世蕃父子，为此，杨继盛夫妻死节，郭希颜被赐死，邹应龙、林润、吴时来、张翀、董传策都被贬黜，邹应龙不屈不挠，返京复命时与孙丕扬分别再上奏章，圣旨决定严嵩放归家乡免死，严世蕃发配充军。严嵩父子稔恶不悛，严世蕃不仅不赴边关，且继续为害乡里。林润再奏朝廷，最后抄没严嵩全家，腰斩严世蕃示众。《鸣凤记》中，皇帝开始宠信严嵩，被其蒙蔽，后来从谏臣们的劾疏中终于了解严嵩及其子孙门徒的罪恶，故下旨查办严嵩奸党，受冤屈的忠臣们也终得平反昭雪。《鸣凤记》对严嵩倒台内幕过程的表现并不全面。忠臣们持续不断地上疏弹劾，作为臣心民意的反映，只是严嵩倒台的诱发因素，严嵩倒台根本上取决于严嵩奸党和反对严嵩奸党的两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此外，世宗嘉

^{①②③}《明世宗实录》，第 8032、8036、8037 页。

靖帝对道教的迷信心理与对青词的特殊爱好也影响到他对大臣的喜好厌恶,这对于严嵩的受宠与失宠、受重用与倒台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较之史实可知,《鸣凤记》对严嵩倒台原因与过程的表现显得简单化了。

在反对严嵩奸党的政治阵营中,徐阶是个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他的运作布置对于严嵩的倒台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夏言对徐阶有荐举之恩,严嵩害死夏言,对夏言举荐上来的徐阶也就有猜忌之心,而徐阶对害死夏言的严嵩、仇鸾等人也具有仇恨心理。“嵩怙宠弄权,猜害同列。既仇夏言置之死,而言尝荐阶,嵩以是忌之。……(徐阶)密疏发咸宁侯仇鸾罪状。嵩以阶与鸾尝同直,欲因鸾以倾阶。及闻鸾罪发自阶,乃愕然止,而忌阶益甚。”^①(卷二一三《徐阶传》)仇鸾是严嵩的早期同党,是严嵩残害夏言和曾铣的重要帮凶,本来严嵩曾想通过仇鸾来倾轧徐阶,后仇鸾和严嵩关系恶化,严嵩串通陆炳将仇鸾置于死地。不过严嵩没想到的是,表面上不露声色的徐阶给皇帝上密疏揭发仇鸾的罪状,严嵩感到徐阶有很深的城府和政治心机,自此对徐阶更加防备。徐阶与严嵩不仅有以上的隙怨,而且还有权力之争的现实利害关系,他们两人同为宰辅,种种利害关系使得两人矛盾难以调和。《鸣凤记》所写八谏臣中,好几个人历史上是徐阶的门生故旧,他们参劾严嵩和徐阶具有一定的关系,徐阶本人也寻机在皇帝面前间构严嵩。《明史》卷三〇八《奸臣·严嵩传》载:“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厌之,而渐亲徐阶。会阶所厚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各疏论嵩,嵩因密请究主使者,下诏狱,穷治无所引。帝乃不问,而慰留嵩,然心不能无动,阶因得间倾嵩。”^②参劾严嵩的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均与徐阶有深厚良好的个人关系。徐阶本传也记载,严嵩怀疑杨继盛、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弹劾他都是由徐阶指使,“杨继盛之劾嵩也,嵩固疑阶。赵锦、王宗茂劾嵩,阶又议薄其罚。及是给事中吴时来、主事董传策、张翀劾嵩不胜,皆下狱。传策,阶里人;时来、翀,阶门生也。嵩遂疏辨,显谓阶主使,帝不听。有所密询,皆舍嵩而之阶”(卷二一三《徐阶传》)。邹应龙后来参倒严嵩父子,也是秉承徐阶的命令,“嵩子世蕃贪横淫纵状亦渐闻,阶乃令御史邹应龙劾之。帝勒嵩致仕,擢应龙通政司参议。阶遂代嵩为首辅”^③(卷二一三《徐阶传》)。严嵩把持朝政二十年,党徒遍布朝野,关系盘根错节,一般人根本不是严嵩的对手,只有徐阶那样地位与资历的人才有斗倒严嵩的力量,可以说徐阶是促使严嵩倒台的重要操盘手。“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其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④(卷三〇八《奸臣·严嵩传》),“言所推毂徐阶,后卒能去嵩为名相”^⑤(卷一九六《夏言传》)。《鸣凤记》中全然未及徐阶扳倒严嵩之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历史上,严嵩失宠被贬,除了政治力量较量失败原因以外,还有世宗迷信心理和个人好恶的因素,严嵩晚年青词撰写不合帝意,这是他失宠而被世宗贬黜的又一原因。明世宗笃信道教,嗜爱青词,青词撰写是否符合帝心,往往关涉着撰写者的仕宦前程。善于揣摩世宗心理、擅写青词者往往受到重用,世宗一朝出现多位青词宰相,严嵩即是依靠撰写青词而获宠的青词宰相。不仅严嵩等青词宰相靠撰青词获帝心,夏言、徐阶这两位先后担任内阁首辅的反对严嵩的重臣也均擅长青词撰写。《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载:“初,言撰青词及他文,最当帝意。”后来,“言进青词往往失帝旨,嵩闻益精治其事”^⑥,夏言所撰青词不合帝意,帝宠渐衰,才给了严嵩中伤陷害他的可乘之机。徐阶在与严嵩争权过程中,一度处于下风,他一方面谨慎侍奉严嵩,另一方面也小心翼翼精治青词迎合世宗,“阶危甚,度未可与争,乃谨事嵩,而益精治斋词迎帝意”^⑦(卷二一三《徐阶传》)。青词撰写是否让世宗满意,不仅在于青词本身的文学魅力如何,还在于青词是否迎合世宗对道教的迷信心理。在夏言渐失帝宠时,严嵩乘机以青词获帝宠,“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宠。言惧斥,呼嵩与谋。嵩则已潜

^{①②③④⑤⑥⑦}张廷玉等:《明史》,第3754、5301、3755、5302、3464、3462—3463、3754页。

造陶仲文第，谋讎言代其位”^①（卷一九六《夏言传》）。但到了后来，严嵩也揣测不出世宗心意，他对世宗手诏的领悟经常不得要领，所撰青词，也不合帝心，渐渐地世宗对严嵩失去了兴趣。“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经此积失帝欢”^②（卷三〇八《奸臣·严嵩传》）。严嵩未失宠时，虽然参劾他的奏章很多，揭露他的罪行很具体，许多奏章写得很尖锐，但依赖世宗的庇护，严嵩岿然不倒。严嵩最后的倒台，既是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也和他晚年渐失帝宠、方术之士进言挑动有关。可以说，严嵩受宠也青词，失宠也青词。严嵩失宠在先，世宗准奏查办他在后。严嵩被查办，根本原因不是他擅权枉法的事实被揭露，而是他对世宗内心想法已经茫然不知所指，他的青词撰写已经失去了世宗欢心。

严嵩渐失宠之时，道士蓝道行借世宗的迷信心理对严嵩射出了一支暗箭，应该说道士蓝道行的话对世宗决意抛弃严嵩具有颇为重要的心理影响，对严嵩倒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史》卷三〇七《佞幸·蓝道行传》载：“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有所问，辄密封遣中官诣坛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穆衷，中官惧，交通道行，启视而后焚，答始称旨。帝大喜，问：‘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恶严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会御史邹应龙劾嵩疏上，帝即放嵩还。已，嵩诇知道行所为，厚赂帝左右，发其怙宠招权诸不法事。下诏狱，坐斩，死狱中。”^③《明史》卷二一〇《邹应龙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蓝道行号称蓝神仙，当时甚得世宗信任，当世宗问为何天下不治时，蓝道行假托上天之言说是严嵩奸行罪恶所致。虽然当时严嵩手握重权，寻机将蓝道行陷害入狱、斩死，但蓝道行的话对迷信的世宗是起作用的，此后世宗愈益冷淡严嵩，亲近徐阶，“未几，帝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④（卷三〇八《奸臣·严嵩传》）。在得知帝意的情况下，御史邹应龙上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严嵩被罢官归乡，其子孙、门党被发配戍守边远。

《鸣凤记》创作于明代，自然不能言及当朝皇帝过失，包括对明世宗笃信道教喜好青词，剧作也避讳不谈。然较之史实可知，严嵩掌权和倒台与他青词撰写先获宠后失宠具有重要的关系，《鸣凤记》全然略过世宗迷信道教对政治斗争的影响，有违历史的原型真实。

三、关于情节与细节真实

《鸣凤记》若干情节与细节，也有对史实进行改造乃至虚构之处。首先关于诸臣平反时间。《鸣凤记》反映的主要是明世宗嘉靖朝忠奸斗争事，为了无碍世宗皇帝的“圣誉”，一些在穆宗、神宗朝平反之事，被移至世宗朝，平反后追赠的一些官职也于史不尽符。《鸣凤记》第41出《封赠忠臣》中，世宗下旨，“故相夏言追赠紫金光禄大夫，仍赐遗腹子袭荫。曾铣、郭希颜并赠荣禄大夫。杨继盛谥忠愍太中大夫，妻刘氏赠节义淑人”。而据《明史·夏言传》，夏言是在明穆宗隆庆年间平反，“隆庆初，（夏言）其家上书白冤状，诏复其官，赐祭葬，谥文愍。”^⑤（卷一九六）曾铣是隆庆年间平反，万历年间建祠祭祀，“隆庆初，给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问讼铣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识与不识，痛悼至今。诏赠兵部尚书，谥襄愍。万历中，从御史周磬请，建祠陕西”^⑥（卷二〇四《曾铣传》）。据徐阶代世宗《拟遗诏》和代穆宗《拟登极诏》可知，因建言立储而被处治之臣，是在穆宗登基后平反的，“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诏用，殮者

^{①②③④⑤⑥}张廷玉等：《明史》，第3462、5301—5302、5289、5302、3464、3590页。

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①（卷五《拟遗诏》），“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后到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诸臣，遵奉遗诏，存者诏用，歿者恤录。吏部、兵部作速查开职名，议拟具奏”^②（卷五《拟登极诏》）。为建言立储之臣平反，明为世宗遗诏，实为穆宗登基后收笼人心的举措，郭希颜应是此两诏发布后于隆庆年间被追恤的。杨继盛也是穆宗隆庆年间被追赠与建祠，“穆宗立，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③（卷二〇九《杨继盛传》）。

此外，一些未死的忠谏之臣的官职，也有将他们隆庆、万历年间的官职移至世宗嘉靖朝的。

关于夏言妻妾关系与遗腹子命运。《鸣凤记》中写夏言夫人易氏，念夫无子，在扬州娶一名叫苏赛琼的女子，用作夏言的偏房，夏言的妻妾姐妹情深相知相惜，夏言落难后，妻子流放广西，为了保住苏赛琼肚中的孩子，妻妾分为两途，苏赛琼由义仆朱裁陪同避居江西，生下夏言的遗腹子，夏言平反昭雪后，遗腹子袭荫继承爵号。而据《明史·夏言传》，夏言妻子较为悍妒，在夏言之妾已有身孕的情况下，将妾改嫁他人，由于夏妻无子，才在夏言死后将夏言之妾母子俩迎归，夏言之子得官后忽得病而死，“言始无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归，貌甚类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无后”^④（卷一九六）。为了替忠者尊者讳，《鸣凤记》作者将夏言妻妾不和改写为妻妾和睦，为了体现善有善报，对夏言儿子只说他袭荫继爵而对他忽然病死略去不表。

关于陆炳在严嵩与反严嵩两派斗争中的态度与作用。《鸣凤记》中夏言、曾铣是由严嵩、仇鸾陷害诬告致死，和陆炳无关，陆炳未出现在夏言、曾铣与严嵩、仇鸾斗争的戏份中。陆炳在《鸣凤记》只出现一次，即第16出《夫妇死节》，身为锦衣卫都指挥使的陆炳监斩杨继盛。该出中的陆炳虽然未救杨继盛，但他敬佩杨继盛，称杨继盛“铁肝石胆真堪羨”，“是个王朝柱石”（[要孩儿]曲），杨继盛被斩、杨妻殉夫自刎后，陆炳称“后日必有旌其忠节者”。剧中的陆炳总体来说，不算是很坏的一个人。而据《明史》，严嵩倾轧陷害政敌，几次都是借助陆炳的力量。陆炳与夏言交恶，在夏言与严嵩斗争过程中，陆炳起的是助纣为虐的帮凶作用。据《明史·奸臣·严嵩传》，夏言地位本在严嵩之上，严嵩以青词邀宠，将夏言排挤出朝廷。夏言被复用回朝后，斥逐严嵩党羽，并欲治严嵩子世蕃之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严嵩感到独力难斗夏言，他“知陆炳与言恶，遂与比而倾言”，严嵩与交恶夏言的陆炳联手，才将夏言遣归省墓，排挤出朝廷，最后严嵩“窥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构言及曾铣，俱弃市”^⑤（卷三〇八）。那么陆炳与夏言是如何交恶的呢？陆炳本来很得夏言与严嵩的欢心，夏言对陆炳很亲近，后来御史弹劾陆炳不法枉为之事，夏言打算查办陆炳，陆炳向夏言行贿被拒，乃向夏言长跪哭泣谢罪，夏言这才作罢，自此陆炳对夏言恨入骨。“言故昵炳，一日，御史劾炳诸不法事，言即拟旨逮治。炳窘，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长跪泣谢罪，乃已。炳自是嫉言次骨”^⑥（卷三〇七《佞幸·陆炳传》）。陆炳参与严嵩构陷夏言事，完全是以德报怨、挟私废公之举。

还有严嵩斗倒仇鸾，也是借助陆炳的参与。为了反对夏言、曾铣，仇鸾依赖严嵩并约为父子，后来仇鸾获皇帝重用，而严嵩还像蓄养儿子一样对待他，两人关系恶化，皇帝听不进严嵩所说仇鸾的坏话，却吸纳仇鸾所说严嵩的坏话，严嵩被疏远，感觉很害怕。当时陆炳与仇鸾也在争宠，严嵩就勾结陆炳共同对付仇鸾，“嵩乃结炳共图鸾。会鸾病死，炳讦鸾阴事，帝追戮之”^⑦（卷三〇八），由于陆炳采用非常手段掌握了仇鸾的不轨之事并将之密告皇帝，皇帝在仇鸾病死的情况下依然将他开棺戮尸。虽然严嵩与仇鸾之斗属于狗咬狗，陆炳攻击仇鸾也有陆、仇两人自身的利益冲突，但总体说来，陆炳非善类，他是严嵩的政治盟友，在严嵩排除异己的过程中他多次扮演的是帮凶的角色。陆炳任用土豪恶吏为爪牙，与严嵩互相利用，坏事做了不少，至于他被作为一个“不坏”之人写入《鸣凤记》中，应该和他保护过世宗朝许多被迫害的忠谏之臣有关，“帝数起大狱，炳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⑧（卷三〇七《佞幸·陆炳传》），陆炳对一些忠谏之臣的保全之功使

^{①②}徐阶：《世经堂集》，四库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存目丛书》集部7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39、440页。

^{③④⑤⑥⑦⑧}张廷玉等：《明史》，第3691、3464、5300、5285、5301、5285页。

他获得了朝士的赞誉,因此他以较为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了《鸣凤记》中。

关于杨继盛写本时其先人之灵出现。《鸣凤记》第14出《灯前修本》,杨继盛上本奏劾严嵩,祖宗亡灵出现,显形发声,形容悲切,为防继盛奏章取祸,还将灯儿打灭,继盛不为所动,坚持上章劾奸。此情节纯属附会,是借取明武宗正德朝蒋钦之事。《明史》卷一八八《蒋钦传》载:蒋钦屡次奏劾阉宦权奸刘瑾,受廷杖、被系狱也依然不屈不挠,在他再次上章写本时,听到鬼声,蒋钦认为这是先人阻止他上疏章的劝告,他对鬼神说道:如是先人亡灵,何不厉声告知?话未停,壁间传出更加凄怆的鬼声,蒋钦义不顾私,继续写本上疏,并说道: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然后声音才停止^①。《鸣凤记》中杨继盛不顾祖宗亡灵劝阻的情节,明显是为了增强剧作的艺术感染力,嫁接蒋钦的传说故事而成的。

关于吴时来、张翀、董传策联名上章参劾严嵩。《鸣凤记》写吴时来、张翀、董传策三人联名共上一疏参劾严嵩,失败后每人被重打八十,并分别被发遣边卫充军。而据《明史》卷二一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三人本传,三人是同日分别上奏,各人所上奏章内容虽然都是参劾严嵩,但奏章具体条状文字并不一致。《鸣凤记》为了使剧情更加紧凑,剧场气氛更加紧张,剧作的艺术效果更加惊心动魄吸引人,而将吴时来、张翀、董传策三人分别上奏改为三人联名上奏。

此外,《鸣凤记》写郭希颜与邹应龙、林润为师生关系,也与史无征。写邹、林师承郭希颜,在郭死后继续高举反严大旗,这样安排,人物关联性强,剧情前后照应,同时也利于表现反对严嵩奸党斗争的艰巨性和延续性。

关于赵文华、鄢懋卿的下场。《鸣凤记》第36出《邹孙准奏》中写严嵩两条走狗赵、鄢的下场是:“赵文华夜饮归家,遇杨椒山阴灵,卒然暴死。鄢懋卿忿恨宠衰,疽发背而亡。”据《明史》卷三〇八《奸臣·赵文华传》,赵文华的死亡过程是:“文华故病蛊,及遭谴卧舟中,意邑邑不自聊,一夕手扪其腹,腹裂,脏腑出,遂死。”^②同卷鄢懋卿本传只交代在严嵩败黜后鄢懋卿先落职后受到查处被发配戍边,未交代死亡过程。由于赵文华死法较为蹊跷少见,同时为了彰显恶有恶报,故《鸣凤记》将两位奸贼安排为不得善终的非正常死法。

《鸣凤记》总体尊重历史事实,但剧作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与评价上,在情节设置与细节表现上,有的于史不符。这有的是由于作者身处当时的时代,有些历史真相未能全然了解,有的是作者为了增强剧作艺术感染力的有意为之。通过《鸣凤记》对史实的有意无意改写,我们可以见到作者政治化书写历史、道德化评价人物、艺术化结撰情节的婉曲用心。

(责任编辑:陆 林)

An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Mingfeng Ji*

FU Di-xiu

Abstract: *Mingfen ji* 鸣凤记 (*The Story of Mingfeng*) is a play about the campaign against Yan Song, the most corrupted and powerful official in Jiajing's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Though the play was regarded to tell a real story, some accounts are against the true facts. Among the heroes (known as “Two Loyalists and Eight Righteous Men”) in the campaign acclaimed by the play, some cannot be accepted as faithful and righteous and others are not representative. That is to say, the deeds of some others who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fighting against Yan Song are missing in the play. In terms of the plot and some other details, the play is also fictitious.

Key words: *Mingfen ji*; historical facts; examination

^{①②}张廷玉等:《明史》,第3317、5305页。